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晚明诗歌研究

WAN  
MING  
SHI  
GE  
YAN  
JIU

李圣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 晚明诗歌研究

李圣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受郑州大学省级重点学科古代  
文学学科点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诗歌研究/李圣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0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02-004111-6

I. 晚… II. 李…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明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1507号

责任编辑:周绚隆 责任校对:周绚隆  
责任印制:张文芳

晚明诗歌研究

Wan Ming Shi Ge Yan Jiu

李圣华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200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02-004111-6/B·259

定价 25.00 元

## 前 言

关于晚明的时限问题,史无定说。清初学者一般称万历至崇祯末的一段时期为明季,亦有把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明政权阶段包括在内的。明季一词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晚明。民国学者倾向把晚明和南明分别认识。现代学界一般视南明为独立的历史分期,晚明下限约为崇祯亡国之甲申,上限大致始自隆庆、万历之际。本文根据诗歌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阶段性特征,确定研究对象为万历至崇祯七十馀年的诗歌<sup>①</sup>。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自万历起,明王朝开始迅速走向衰落。陈田《明诗纪事》说:“万历中叶以后,朝政不纲,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缙绅树党,亡国之象,已兆于斯。”孟森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依奄人四出聚财,矿使税使,毒遍天下”<sup>②</sup>。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沈一贯、方从哲等大抵是庸人柄政,专于依阿帝王取宠,排击倾轧正直士人,朝内缙绅树党,“水火薄射”<sup>③</sup>,国家政治生机活力剥蚀殆尽,朝政日趋没落。至天启帝浑浑噩噩,大权旁落到魏忠贤宦官集团手中,阉党横行,“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sup>④</sup>。崇祯帝治阉党之乱,但未能挽救朝政混乱局面,根据曹溶所作《崇祯五十宰相传》,即可知时局之混乱、衰败。王朝国力衰竭,难以抵御咄咄相逼的满洲军事力量,并困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烽火

四燃，终以覆国。

晚明历史激变在经济和社会风尚方面表现同样明显。农业衰颓，城市和商业经济发展迅速，一面是贫富分化严重，民不堪其苦，一面是世风侈靡，纷杂万象。当时以及清初的学者就注意到这些变化，万历十六年，余继登在《交河县志序》中说：“予闻诸长老云：‘弘、正以前俗尚敦朴，士以志行相高，野无惰农，市无淫商，贾无绮靡之奉，下不敢干上，少不敢僭长。’今何如矣？美衣媮食，即诵法孔氏者犹然，无论商贾。农弃业为贾，贾弃业为游食，轻纤之适，声伎之娱，即无担石者犹然，无论豪富。”<sup>⑤</sup>交河县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情形尚且如此，东南经济中心苏州，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张瀚《百工记》记载：“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sup>⑥</sup>徽州一带商贾四出，情况大致如此，顾炎武《歙县风土论》即指出弘、正间“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至嘉、隆之际“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年”，万历以后“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政治、经济、世风的激变构成晚明士子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动因与契机。政治黑暗迷乱给士人带来极大的人生困惑和沉重的精神负荷，经济与世风变化又促使放纵自适士风流行，士人身上交织着自我的清醒与道德的困惑、狂健的进取与放纵的沉沦、精神的自守与戾气的外放，世态百象如狂

狷、愤世、孤傲、纵情、自适、隐逸、禅悦、自洁,在这个时代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思想界存在着新生和陈腐、开放和禁蔽的尖锐冲突,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禅宗思想、老庄学说及市民意识相互摩擦、融合,大有争鸣之势。其中,两大变化趋势引人注目:一是士人接受左派王学,融合三教,个体意识高扬,肯定自然人性,嘲弄来自上层建筑的禁欲和蒙昧,推动晚明异端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士人为振兴世道,主张用实,从维护礼法和程朱理学出发批评异端思想和尚谈心性的学风,这一思潮至明末渐占上风。

晚明社会的自由与禁蔽、凋败与繁荣、新生与破灭种种情势的共生,蕴育诗坛蜕变衍化的契机。公安派独抒性灵,在文坛推轂晚明异端思潮;竟陵派感于幽愤,以凄霖苦雨之声传递现实幻灭之感和对澄明世界的追求;晚明闽派熔铸文学妙悟、性情,倡导革新;江浙山人诗人疏远科举,以诗文、技艺标示个体存在;山左诗人在闷音鸣世理想破灭后,走向愤世急烈;东林、复社、几社士子面对世道衰微,诗歌追求世运、性情、学问相合一的旨归,其中杰出之士在天崩地解之际,激流勇进,以热血谱写爱国诗章;女诗人挟区域、家族文化传习之优势,以独特的敏感和才华,振兴闺秀诗坛,规模之磅礴、态度之率真,均诗史前所罕有,共同谱写出晚明诗歌多元灿烂、于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一部乐章。

## 一 晚明诗坛概况

其一,诗人涌现,诗派群体更迭,诗论纷出。晚明诗人数量目前尚无具体统计。天启初年,钱谦益着手编次《列朝诗集》,间隔二十馀年复续其事,至清顺治六年辑成八十一卷,著录明诗一千八百馀家,晚明作者占半数,但该集录诗略于明末,如公安派

约二十馀位诗人,收录不过公安三袁、陶望龄、黄辉、雷思沛、秦镐数人,竟陵派仅选录钟惺、谭元春、商家梅、葛一龙等数人。朱彝尊有志补《列朝诗集》所缺,晚年编成《明诗综》百卷,录存三千四百馀家,详于明末,广收明遗民诗,如果计以遗民诗人,晚明作者居半,已超过《列朝诗集》总数。清末民初,陈田历十七年编《明诗纪事》,评录四千馀家,较《明诗综》更详于明末,即使如此,所遗仍不在少数,如本文附录三列举的二百零九位女诗人即不在其内。初步推测,晚明有诗文编册成集的作者逾千家。庞大的诗人阵营构成流派群体踵兴的基石。嘉靖中叶,文坛尚不见流派纷呈之势。隆万之际,后七子派分化出新安诗群一支,浙东形成甬上诗派,闽中有晚明闽派,越中和山左诗群亦具规模。尔后,公安派,竟陵派,东林、复社及几社诗群,争衡文苑。诗人各标诗说,争鸣激烈。李贽“童心”说、徐渭“本色”说、汤显祖“有情”说,及屠隆“适性”说,开启公安派先河,而公安派诗人阐释“性灵”,各立新论,袁宏道倡“独抒性灵”,江盈科论“元神活泼”,陶望龄称“偏至之独造”。竟陵派主张“隐秀”,复社、几社提出“适远”,山左诗人相继标举“齐风”和“侠诗”、“禅诗”,晚明闽派提倡融合妙悟、性情。诸如此类的各持一说,体现了诗坛繁荣与创新自立。

其二,创立一代明诗的文学意识空前高涨。无论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还是晚明闽派、几社诗群,建构一代明诗以复兴文艺的革新意识都相当凸显。胡应麟《诗薮》称李梦阳“开创草昧”,张维任认为李梦阳“有开创扫除之功”<sup>⑦</sup>,李贽反对模古,但谓李梦阳:“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sup>⑧</sup>袁宏道力掊复古,而对李梦阳、何景明开辟一代明诗的功绩公认不讳,《答李子髯》诗云:“草昧推何李,闻

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sup>⑩</sup>公安派提出异于复古的诗歌“机轴”，陶望龄为明诗呐喊：“从来诗道，大明派头甚正。”<sup>⑪</sup>并解释“大明派头”之诗说：“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皎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sup>⑫</sup>雷思沛盛赞袁宏道“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异梦不相干”诗句，《潇碧堂集序》亟称“石公（袁宏道号）之诗，石公之自为诗也，明诗也”。钟惺明确提出“明自有诗”、“人自有诗”<sup>⑬</sup>。山左的公鼐表白“丈夫树立自有真”，“愿成昭代一家言”<sup>⑭</sup>。晚明闽派继承明初、中叶闽派之绪，力振闽中诗坛。诗人创立明诗的意识 and 可贵探索，使晚明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系。

其三，诗歌运动与时代思潮相融合互动。左派王学与三教合一及市民思潮的交融，推动了李贽为首的狂禅派形成，公安派为文学界异端思潮的代言，肯定自然人性、个体独立，要求诗歌率性任真。竟陵派追求“独拔”的人生和艺术，体现了狂禅派受挫后社会思潮的变迁。东林士子讲求程朱之学，批评空谈心性，注重用实，复社和几社承继东林学术，关心现实，诗以“适远”，以补益于世道，这一诗歌取向与东林建立的学术传统密切相联。

其四，诗歌主流嬗变的阶段性。万历初，后七子派中兴，并发生新变；越中、甬上、山左、闽中区域坛坫兴起；山人诗流行于世；李贽、汤显祖、徐渭自成一帜，这一多元变化奠定诗坛新格局。万历中叶，公安派倡导诗歌革新，与异端思潮水乳交融；尔后竟陵派寓性情于寒苦之音，“浸淫三十馀年，风移俗易”<sup>⑮</sup>；闽中、山左、松江区域坛坫取得较快的发展。崇祯时，明王朝臻于一触即溃，复社、几社将文艺复兴与国运振兴相系联，体现了明末诗歌的主流走向。简而言之，晚明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独抒性



灵、张扬个性，到独拔隐秀、涤空孤诣，再到世运、性情、学问合一的主流演变过程。

其五，诗派群体之间激烈的文学争鸣。尊“道”还是崇“文”？守“格”还是主“情”？昵“古”还是重“今”？三者是晚明诗歌创作和理论争鸣的中心问题。

历史进入晚明，新思潮之“道”取代程朱之“理”，诗人尚情贵真，任法自然，体现了文学与时代思潮的融汇。公安派疏澹性灵，确立诗歌革新走向。异端思潮受挫，竟陵派寒苦之音传递了社会黑暗中的士人苦闷情绪，“隐秀”诗观即包含人生和文学的双重旨归。复社、几社注重经学和温厚诗教，但反对诗歌纯粹说理。总之，诗人对“道”的理解变化，消解了明中叶以来“道”与“文”的矛盾（前、后七子反理崇文）。

后七子派的新变表现出以性情消解格调束缚的倾向。李贽、徐渭及公安派彻底破除格调与性情的界限，认为诗本无所谓格调，如果有，也是性情各异的产物。竟陵派肯定文学流自性灵，诗无定法、定格。几社诗人批评公安、竟陵派，希望通过清理无定格、定法之论，统一并振兴诗坛，与此同时，指出不应迂腐循守温厚中和诗教，格调不关世运，虽好而必不习之。

后七子派后期承认师古之外还须师心。公安派近于完全否定师古，推重师心自尚。竟陵派认为师“古人之精神”是必要的，别开融合师心和师古的门径。山左诗人持论和竟陵派相近，在公安派、七子派之外，寻求熔铸古今的诗路。吴中诗坛前期倾向师古，后期转求师心与师古的契合。复社和几社诗人既反对一味拟古，更反对师心的无程则，强调融贯“古人之精神”与“诗以用世”的重要性。

其六，诗歌创作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色。诗人追求情、真、善、美，关注现实、人生，无论标榜古人，还是命世当今，创作都富

于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饱含热情和创造。袁宏道肯定诗人“意兴所至,随事直书”<sup>⑮</sup>,江盈科论诗主张“宁质,宁朴,宁掀景眼前,畅协众耳众目”<sup>⑯</sup>。《明诗纪事》评二人诗“近俚近俳,正复相似”。“近俚近俳”正意味着诗歌走向生活、走向平实,如徐渭《燕京歌》七首、袁宏道《灯市和三弟》、江盈科《迎春歌》,载述人情习见,江盈科《述怀》、袁宏道《陶石簪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张扬自我。袁宏道《猛虎行》、钟惺《己丑藏稿》、沈德符《天启宫词》抨击矿税或党争,力度深厚,堪称一代诗史,陈子龙《秋兴杂感》、夏完淳《精卫》、《长林细哭》载述亡国之悲和赤子爱国之情,感人至深。诗人各抒性灵,创作风格多样化,如王世贞的平淡、屠隆的高华、徐渭的雄肆、李贽的平实、王稚登的萧逸、陈继儒的朴野、冯梦龙的俚俗、袁宏道的洒脱、江盈科的细切、钟惺的幽峭、谭元春的清冷、公鼐的爽丽、王象春的奇警、王思任的涤宕、高攀龙的冲夷、谢肇淛的细润、曹学佺的浅淡、陈子龙的哀艳、黄道周的博奥、沈宜修的清怨、叶小鸾的高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晚明诗人正是以贴近时代和个体的心音体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心路历程。

## 二 清初以来对晚明诗歌的批评与研究

四百余年来,晚明诗歌的接受与批评历经曲折。公安、竟陵诗风在清初痛遇排挞。钱谦益、朱彝尊、王夫之等人的厉词批驳,尽管出自不同批评立场,或政治分歧的,或个人恩怨的,或审美意趣的,或艺术旨归的,但正本清源和复归大雅的宗旨出奇一致。明末几社实开启此一风气,不过大力的运作还是由清初诗人在历史变更中实现的,其中,钱谦益、朱彝尊影响最大。钱氏嗤点前贤,力挽“大雅”。朱氏订正钱氏误说,按曾燠《静志居诗

话序》的说法就是“正钱牧斋之谬”，可是二人不存在根本认识分歧，细则不论，就批评范式言，他们树立的都是复古与革新“矫枉过正”的批评体系：后七子拟古而弊生——公安派救弊而陷于“纤佻”——竟陵派以蕴藉救公安之弊而失于“鬼国”、“幽峭”——复社、几社再起而救弊，复兴雅道。这一批评的失误是明显的，而且已远超出了诗艺高下和是非问题，言辞之尖刻、态度之严厉、抨击之凶狠、结论之酷重，在中国诗歌史或文学批评史上均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定谏钟、谭为有害于世的“诗妖”，对竟陵一派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成为在封建历史时期不容辩白、无可甄别的铁案<sup>①7</sup>。

清中叶继续“清理”晚明诗歌“馀毒”，特殊的是，官方介入“肃清”运作。沈德潜等人编《明诗别裁集》，大致据“唐音”为甄选诗，合则录入，不合则去，一代诗歌几乎成了唐诗风雅点缀，可谓选非其人，精光不显。官方的清理，主要来自清廷严令禁毁与《四库全书》之舍弃、窜改、抽毁、误评。乾隆时的禁书活动从三十九年(1774)起，五十七年(1792)结止，禁毁图书数千种，晚明文献占相当比重<sup>①8</sup>，以数以千计的别集为例，《四库全书》集部著录，若从王世贞之集算起，至明末不过四十余种。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晚明诗人，因袭钱、朱旧说，即使创为“新论”，讹谬亦比比皆在。在政治极权和思想封闭干预之下，对晚明诗歌的批评真正陷入一片“黄茅白苇”。鲁迅先生谈起清人清理晚明诗文的作法时，一语破的地指出其弊：“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sup>①9</sup>清中叶近于“捣毁”似的批评给后世带来巨大负面作用，清末民初，陈田编一代巨帙《明诗纪事》，所下按语和选评眼光远比沈德潜及清代四库馆臣高明，可惜仍未能有较大的突破。

当然，应当看到主流之外的一些言论。清初，施闰章致书陈

允衡,指出钟惺之诗“深情苦语,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陈允衡复书说:“冷之一言,其诗其文皆主之,即从古人清警出。”<sup>②</sup>袁枚《随园诗话》认为:“人谓钟、谭诗入魔,而其佳句自不可掩。”咸丰六年,李慈铭读《袁中郎全集》说:“公安之派,笑齿已冷。皆谓轻佻纤俗之习,创自石公。今观其全诗,俚恶者固不免,……然佳处亦自不乏,静绸之思,幽隽之语,触目皆是。中郎一门风雅,出处可观,其得盛名,良非无故。后人固不可专学此种,而论诗宜平心审定,公是公非,自有千古,不可执其瑕颡,因噎废食,遂至埋没古人。”同治四年,又读《谭友夏合集》说:“竟陵之派,笑齿已冷。……前年在京师,见所选《诗归》,虽识堕小慧,而趣绝恒蹊,意想所营,颇多创得。因谓盛名之致,必非无因。”<sup>③</sup>然而这些言论终不能挽回清代“千喙一谈,竟从摈绝”的批评潮流。

民国时期,晚明诗歌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于三、四十年代形成高峰。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钱杏邨、刘大杰、钱基博、钱钟书、宋佩韦、朱东润、郭绍虞、谢国桢、容肇祖、嵇文甫都对明代文学、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周作人、林语堂、刘大杰探索“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从公安派入手,更新批评晚明文学的观念。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明清文学革新主流定格于公安派。刘大杰在钱杏邨、郁达夫、林语堂协助下校刻《袁中郎全集》,并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指出:“清人对于中郎作品的批评,大半是说他俚俗诙谐,说他学问的根底不深,这实是错误的。俚俗诙谐,正是中郎文学的特色,他的诗文,平浅易解,并不能说他的学力浅。……把袁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的了。货色虽为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他们以新文艺批评家的眼光,给予公安派很高评价,某种意义上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结果。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和宋佩韦《明文学史》则对明诗复古评价较高。不过,肯定诗歌革新与“性灵”文学思潮的批评大致居主流。方孝岳《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郭绍虞《性灵说》一文详细阐释了公安派“性灵”说。钱钟书《谈艺录》问世,即罄售一空,其中探讨晚明诗歌的一些观点对当前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容肇祖、朱东润、谢国桢、嵇文甫确立明代学术、政治、文化研究方向,涉足领域广泛,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和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巨著推进了诗歌研究,容肇祖《李贽年谱》、《焦竑年谱》,金云铭《陈第年谱》,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等虽非专为研究诗歌而作,亦从侧面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的晚明诗歌研究不仅未在此前基础上深化,而且显得萎缩不少。八、九十年代,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更新的情况下,始再呈现繁荣景象。有关诗文集出版方面,大陆起步晚于台湾,台湾七十年代刊行的《明代论著丛刊》,就包括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及复社、几社文人的一批重要集子。大陆出版业发展速度,使人略感欣慰,陆续刊印了数十种晚明诗文集,出版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系,《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相继问世,《全明诗》、《全明文》编纂工作已进入日程,地方文献整理如岭南作家丛书、明清山左作家丛书、两浙作家文丛、安徽古籍丛书都关注了晚明作者之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拓展。当代学者重新审视明诗的历史面貌,探索层面不断扩大,形成一批成绩不斐的专著,如《晚明文学初探》(马美信)、《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廖可斌)、《明代诗文的演变》(陈书录)、《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左东岭)、《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黄卓越)、《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周明初)、《十四至十七世纪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陈建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郑利

华)、《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饶龙隼),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徐朔方先生编著的《晚明戏曲家年谱》、章培恒先生主编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亦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方便。概而言之,此期研究已从选择性的分析,走向了较全面、系统化的阶段,成就是多方面的,突出地表现在:探析晚明文学思潮,从思想史、哲学史等关联角度分析诗歌演变历史;研探晚明文化特征和士人心态变迁,把握诗歌文化意蕴和特征;重新认识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艺术创造和诗史价值,逐步构建批评明诗的理论体系。

二十世纪晚明诗歌研究的成就是清人未足比拟的,而其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宜忽视。

第一,明诗不如唐、宋诗的批评意识。明代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可与元杂剧、宋词、唐诗相提并论,为现代学界所公认,而关于明诗远不如唐、宋之诗的看法,不要说一般的文学受众,即使对一些专业人士而言,亦司空见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带有诸多偏见和盲从的说法已严重阻碍了晚明诗歌研究进程。艺术成就存在高低区别,但从诗歌作为一种“为人生”、“为社会”的语言艺术,作为一种抒情的载体和时代文化语言符号的角度上讲,唐诗、宋诗、明诗之间并无根本的优劣与高下之分,而且在艺术创造方面也不宜简单论断明诗不如唐、宋诗。任何时代的诗歌都具有其特定的文化与艺术个性,诗歌艺术本身丰富多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单一”的艺术规律并不存在。晚明诗人旨趣与唐、宋作者显然不同,艺术才情亦不尽相同,那么,以唐、宋诗衡论明诗,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根据唐音评定明诗,轻视时代性和艺术个性,明、清的诗论家已有不少这类失误。沈德符《马仲良诗集序》指出:“耳食之徒,每深文于唐中叶,若赵宋则交喙置之。夫唐、宋者,人也,性

情亦何唐、宋之有？倘以万历之人，发抒万历之性情，试按其语，乃得唐人之未曾有与宋人之不能有，是亦诗之跻巅造极，观于是乎，止矣！”<sup>②</sup>文字很简单、平实，不无借鉴意义。

第二，批评运作中的宗唐、宗宋话语。宗唐和宗宋是明代诗坛长期争鸣的问题。清人评说明诗，尤好采用宗唐、宗宋的话语，甚至有人以复古等同宗唐，以革新等观宗宋，无视当时诗坛对“真”与“质”及“情”与“格”的探索争鸣。为此，清代诗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严迪昌先生认为：从诗史角度看，《列朝诗集》操持选政，使得诗歌领域内“真”与“质”、“情”与“格”之争，回归到诗的体格范围内的异同之辩，导致清诗在整体上长期胶结于宗唐溯宋、唐音宋调的争辩和宗法的转换。这是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和关目，由公安、竟陵凿宽渠流的强调诗人个体自觉的历史，到清代重新接续时由此而显得那样步履维艰，迂回曲折。清代诗人，特别是才性飙发的诗人走自己的道路时，负荷得太重，花的代价也更多了<sup>③</sup>。

晚明诗人取法上存在学唐或学宋的倾向，这是诗歌继承发展难以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宗唐或宗宋，均非其特质，亦不意味不可驾轶古人。认识这一问题，不宜过分夸大，以偏概全会滋生很多误解。陶望龄、雷思沛关于“明诗”的呐喊，足以醒寐，试想晚明作者自标如此，今人论其诗，如果一味胶结于宗唐、宗宋批评话语，不免过于自设樊篱了。

第三，钱谦益、朱彝尊批评范式的遗存。钱谦益以倡导大雅自任，围绕明诗复古与革新，构建所谓的对立与矫弊的“变通”理论。朱彝尊步其后尘，发展此说，清代四库馆臣大抵是承袭这一批评统绪。其实，夸大对立和救弊，主观树立诗史演变单一规律，无助于显现一代诗歌演进、变革的丰富内容。可是，二十世纪明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未真正走出钱、朱批评范式。民国

学者为公安派鸣不平,但在具体问题认识上存有较多偏仄,对七子派的误解,对竟陵派的漠视,更说明其研究的历史局限性。直到八九十年代,局面有所改观,只是还谈不上彻底突破了钱、朱批评,诸如现代流行的复古与革新“对立”说、“互补”说,算不上新鲜的论调。

第四,诗歌创作研究的边缘困境。二十世纪与晚明诗歌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侧重点大致落在揭示诗论、诗歌与学术思潮之关系方面,创作研究显得不足,这一现象在八九十年代表现尤为突出,诗歌自身研究愈来愈处于边缘。哲学、文化研究取代不了诗歌创作的探讨,走出这一边缘困境当是今后晚明诗歌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以上研究问题,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一、进一步拓宽研究层面。我们的研究还有许多待于深入认识的课题,如新安诗群、晚明闽派、山左诗群、甬上诗派、粤东诗派、女性诗歌、山人诗等均是。二、拓展研究方法,以利于认识深化。如从区域文化角度探讨明诗,不失可行之举。明诗与区域文化关系密切,公安派、竟陵派重要诗人多占籍湖北,自标“楚人”,宣称“楚风”。越中诗人接受阳明、龙溪之学,诗歌“尚理”色彩浓重,徐渭、陶望龄之诗即体现了这一区域特色。再如从结社角度切入研究,对揭示文坛风会与诗派演变来说亦不失为一个视角。民国时期,谢国桢、郭绍虞等人通过结社认识明代学术和文学,颇见成效,可是,当前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三、更多关注诗歌自身研究。文学研究不排斥学术热点,但要少一些盲从,多一些独立和理性。四、当前研究要走出困境,重要的一点便是走出钱、朱批评明诗的理论模式,重新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说,并走出“宗唐”、“宗宋”批评话语模式。五、提倡多元的批评。诗史不具有“某一种”终极形态,我们阐述诗歌历史,应该对其复杂形态



和规律作一定程度上的把握,而不是陈述其终极形态。就和规律不是本质一样,诗史揭示的规律并非文学自身,如果把诗史统一于“某一种”形态,规律变成单一的、终极的真理,那么,文学研究可能变为某种模式的图解。我们的研究,根本上言,不是寻求“单一”,而是尽可能展现诗史的丰富而复杂的存在。

- 
- ① 《列朝诗集》收诗大致以崇祯亡国为限,《明诗综》多采明末诗和明遗民诗,《明诗评选》偶涉及明遗民诗,《明诗纪事》广收明遗民诗。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凡例》:“是书所搜辑史例之时代范围,由明季万历至崇祯,以迄清初康熙间平定三藩事件时为止。”又,“是书略仿杨凤苞《南疆逸史跋》之例,以时代先后,而以事实内容发类副之。大要分为两个重要时期,而以甲申为限断。其一则是以甲申之前,上溯到万历为一时期。”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吾兹所论,只明季自万历至永历一段。”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这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以略相当于西历十六世纪的下半期以及十七世纪的上半期。”(第1页)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认为中国的明王朝自万历年间起就进入了晚明。(《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徐朔方先生《晚明戏曲家年谱自序》:“与其说任意提前晚明的上限,倒不如说以他们(指徐霖、王济、郑若庸、陆粲、陆采、梁辰鱼、徐渭、谢谿八人,均出生在嘉靖前)作为先行者而排列在《苏州卷》、《浙江卷》的前面。孟称舜的部分戏曲创作完成于易代之后,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也一样,但他们在明亡之前都已经成名。收入本书的更多戏曲家则活动于万历或天启、崇祯间。这是本书题名冠以晚明的依据。”

- ② 《明清史讲义》第246页,孟森著,中华书局,1981年。  
③ 《明史》卷二二九。  
④ 《明史》卷三〇六。